

有史料载，柴桑（今九江）是晋朝大诗人陶渊明的故里。很多年前，我在这个县务过农，后来又参与过县里的文物工作。在我的印象中，因为没有社会地位，有关陶渊明的生平，除了他自己不算太多的传世文字，见诸其他社会历史文献的记载很少。

陶渊明死后十四年出生的沈约在《宋书·列传·隐逸》里列上了陶渊明，说他“曾祖侃，晋太史司马”。此外，关于他的家世再无一言。陶渊明显然是沾了做过太司马的曾祖陶侃的光；陶渊明生前诗友颜延之写过《请节徵士诔》，感慨多于史料；昭明太子萧统倒是编过《陶渊明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仍是陶渊明本人的夫子自道：“渊

“桃花源”在哪里

陈世旭

明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

但那“实录”录的其实是精神情状，关于他本人的履历，仍是语焉不详。别人除了从中知道他的“宅边有五柳树”，并“因以为号焉”；知道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知道他“好读书，不求甚解”；知道他“性嗜酒”，“期在必醉”；知道他的家“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知道他总是“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知道他“常著文章自娱”，“以此自终”，之外，则不知他是“何许人也”，闹不好是上古时候的老百姓：“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陶渊明显然不指望有谁会给他写悼词，也就不必留下写悼词的材料。他是清高了，却给

靠他吃饭的后人留下了许多麻烦：

关于陶渊明故里，学者们歧义颇多，一直争论不休；陶渊明的生年，我在正式出版物起码看到不同的三种说法；至于“桃花源”在哪里，说法就更多了。

一说是在庐山脚下。依柴桑栗里为其故里说，以陶渊明那样贫穷的一个有文化的老农民，即便有雅兴旅游，能走多远？喝醉了酒，兴之所至，跌跌撞撞地在附近山垄转悠，“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归去来兮辞》），忽发奇想，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当地文旅部门居然真的发掘出一处山林溪流村舍，称其酷似《桃花源记》中“先世避秦世乱”的“康王谷”，随即在交通要道俨然矗起高大的“桃花源”金字牌坊；而邻省湖南，不仅有桃园县，还真有像模像样的



万物自得

“桃花源”。某年，参加湖南文艺出版社办的笔会路过那儿，不由一愣；之后又听说，皖赣接壤处又发现了一个“桃花源”。想想，一过彭泽就是安徽地界，当年还没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彭泽令在不得意的公务之余散心逾出了现今的省界，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类似的公案看来永远不会有断的时候。后人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甚至也不在山水，而在

山水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桃花源记》所“记”，是否实有其地，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并不重要。认真了，就不免迂阔。

然而对陶渊明来说，“桃花源”是确实有的——不在任何别处，就在他的心灵里。

陶渊明“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这是何等自然。”（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在这篇并非专门研究陶渊明的讲稿里用一再的强调明白而准确地给了陶渊明一个定位：自然。

这自然是静穆的：“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也是激动的：“刑天舞干

万物自得

蔡皋文/图

还是愁。

三伏嫁了，天就渐凉，叶子知秋不独梧桐。

三伏天的闺房可不空，来了五月里的客人：栀子花、忘忧草、凌霄花，还有一株金银花。啧啧，它们模仿起五月来，全部都开出花来。

这是城南新鲜事，还是城南旧事？

也不是凡栀子花都有兴致开花，我家的五六株中，只有两株有此兴头。

朱顶红，有一株朱色，三株粉红的开着。其余二十余株就不肯浪漫，保持学者的深度沉默：模仿春天，春天是可以模仿得了的吗？

凌霄花开最多，大把开花，大把挥霍着它的热情，落下剩余的花，像放鞭炮一样，一地红。

楼顶如此浪漫，真是天知地知，花知我知。我知花知，花知我知，我真是一个有福的人，万物自得。万物自得是天赐的福分，是不是这个样子呢？



社区图书馆打来电话，说他们已谨慎开门，在三月前订的书可以来拿了。图书馆已关门三个月，我的兴奋一时难以名状。

和管理员通话时问了一句：“想照张照片行不行？你们肯定有不少历史性的变化的。”她干笑了几声，说当然可以。回想起来，她的笑不仅古怪，还有些尴尬。

不少人都觉得图书馆冷冰冰的，但我的感觉却相反。我每借一本书，它便会自动送来一封幽默的e-mail，说：谢谢你借阅，这本书市场价多少钱，这就等于你省出了同等的钱。于是，当我在银行的存款并无增长的情况下，在图书馆的记录上，虚钱却呼呼冒进。

在我的想象里，自己会与另外一些前来拿书的人走到图书馆门前，排成间距两米左右的队，然后像朝觐一样鱼贯而入。图书馆很快就到了，设在露天，一个用黑布做的帐篷。长桌上摆着三个还书用的大塑料箱，管理员则躲在几米开外的门后。她是个高大的女人，戴着猫头鹰般的眼镜，衣着简朴。

连我在内，共有四个人等着拿书。她在一扇玻璃门后站着，看见人来却不敢靠前，等我们报上名字后才匆匆过来，把书放在桌上就迅速躲回门后。我原来以为能和她聊几句家常的，毕竟是久别重逢的老邻居。后来回忆这个交接书的过程，我却觉得它更像一场失败的幽会：一方显然事先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从那个迅速跑回玻璃门的背影看，在伊的眼里，人们就像狗熊或马蜂那样可怕。

拿书的过程如此短暂，吃了闭门羹的我只好在附近的公园消耗多余的精力。偶然与一朵大蘑菇相遇，我便把一本书拿出，当作比例尺比了比大小。对这本三个月前预订的书，我已失去兴趣。

一路行人罕见，仿佛因为睡美人碰了那个纺锤，整个社区都不省人事。但我知道，这不是童话，人们并没有沉睡，而是在躲藏，昔日那个宁静简单的世界已不复存在。

回到家里，我把两本书仔细研究一遍，然后意识到，它们之所以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到，是因为两个原因。罪魁祸首当然是新冠。另外一个，这书是分别从两个小镇图书馆调来的。从小镇到我这里，不知几经倒手。所以，图书馆还随书送了一个新冠书签，提醒戴口罩、洗手、社交距离。但它忘了最重要的一点，即每个人在拿到书的时候都会做的，就是像我一样，会用消毒纸巾把书的封皮底都擦拭一遍。自从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们似乎变得特别多疑，这种多疑让我们失去了许多简单的乐趣。所以，看着眼前这两本书，我犹豫了起来。

重见图书馆

(加拿大简杨)

伏天吟

王养浩

—

新蝉鸣高柳，轻风拂绿洲。
梅雨未尽伏天至，红日没出头。

翠莲银荷芳舟，游人悠悠，青草稠稠。

二

何时雨休哉？群蝉声也哀。南方洪涝酿成灾，农庄漫江海。昨夜军令指派，大爱涌怀，红日放彩。

三

三伏天，金桂香满园。游人诧异秋日艳，酷暑上苍赐花仙。能不忘流连。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待新冠带来的变化，我特别头痛公众空间里各种各样的设限，只希望那个旧的生活秩序早日回来，能畅通无阻地行动和呼吸。对于疫苗何时能够问世，专家们颇有分歧，一到几年不等，也有说病毒会与人类长期共存，那么，图书馆的运行变化会持续多久呢？

也许我今后会把自己的外孙们讲述“新冠前”的生活。对那些不曾在图书馆坐过、没在一排排书架前找寻、对书香与静谧交织的特殊气氛感到陌生、没有机会用双手与书籍做亲密接触的人，图书馆会变成一个曾经的传说吗？

老来复归童年的事例很多。听书即是一例。早年选择听书，是因为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如今每每用听书代替看书，则是眼力渐渐不济，而亲昵书籍的心，依然未死。

平生最早的听书，可以追溯到学龄前。酷爱苏州评弹的父亲，喜欢带还没有上学的我，一起进书场。记得第一次去时，懵懵懂懂，还以为是去看戏呢。听书毕，回家，姆妈等在弄堂口，问：“戏好看吗？”我答：“好看煞了，一个人立起来，一个人坐下去，一个人立起来。”姆妈跟邻居们哈哈大笑。可爹爹锲而不舍，照旧带我同去，直到我开了窍，吴侬软语，浅奏低唱，慢慢地听出味儿来，慢慢地不可一日无此君起来。父亲有一把三弦，他会边弹边唱：“隆冬，寒露结成冰，月色迷蒙欲断魂……”很快，我们姐妹数人都学会了。可以说我们最早的红学启蒙，是《红楼梦》小人书与弹词《宝玉夜探》。

如今已退休，更值抗疫宅在家里。先有朋友散步时介绍听书的好处。开始还不以为然，想我好书还读不完，好剧还追不完呢！过了一段时间，朋友们交流起听《追风筝的人》的体会来，阿米尔如何如何，哈桑怎样怎样，我为自己插不上嘴而落寞。很想读，一时又弄不到书。

正在这时，老领导给我发来了“读书369”，在几百部古今中外名著中，《追风筝的人》赫然在目。大喜过望。于是我悄悄追听。追了些时日，朋友们正好争论起阿米尔诬陷哈桑能不能原谅的问题，我猛然插上嘴去，让她们惊喜不已。而我，也因此像是回到了童年，回到了评弹，听

书又“不可一日无此君”起来。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的代表作

《鼠疫》，早就想读，却因为自己从小厌恶老鼠，不喜欢看这“鼠”字，书都到手了，

见满目都是这个笔画繁多的触气字样，竟合拢，放弃阅读了。这回，身处疫情，想该鼓起勇气“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语）了。再说，听书嘛，用耳朵，眼睛得以避开恶心字，好多了。正式听《鼠疫》时，不知怎么的先去看了下听众留言，发现有一位跟我一式一样，也是从小就厌嫌鼠类，至今听书前还不敢看页面上的鼠形题图。我实在忍俊不禁了：哈哈，谁说知音难觅？承蒙她提醒，我也每次尽量不看那只黑鼠题图，还几次想给小编提建议：能不能换上迪士尼米老鼠的形象？米奇也好，米妮也行。

小说写八十多年前西班牙一个小城鼠疫流行，里俄医生秉持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夜以继日地救助患者。后来，他妈妈也协助儿子当上了一名志愿者，时时刻刻战斗在抗疫第一线。她陪伴病人，也陪伴儿子，一边打着毛线。“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爱的力量如许！记者朗贝尔是法国人，被封在了西班牙，一心想逃离。千方百计逃不出去，突然觉悟，追随里俄大夫当起了“逆行者”。小公务员格朗以为自己必死无疑，连自己的东西都让医生烧了，结果却一夜未死，医生里俄知道疫情出现了拐点，正当大家都松了口气，发病最晚的塔鲁，却在黎明前倒下。塔鲁是位写作者，性格阳光，为人有趣，他的日记后来为小说提供了许多真实素材。塔鲁因此得以为小说中永生。

像《聊斋》《画皮》等这样被标记为“童年噩梦”的影视剧，其实也是情感教育不可缺的一部分，通过这些作品，一个孩子会初步知道在害怕和恐惧的背后隐藏着什么，会发现悲剧产生的源头，会对人性的复杂有所感悟……成年之后回头看，会觉得这些影视剧其

实也是在讲述真善美的力量，只不过是用了稍微深邃一些的手段，或者说用对假丑恶的批判，展示了真善美的可贵。

在不同的年代，影视作品在表现真善美方面，所讲述的故事、塑造的人物、使用的技巧是不一样的，比如九十年代《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外来妹》等剧的火爆，宣告过去负责承担真善美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被逐渐淡化，取而代之是与时代紧密相关的现实主义，观

众在刘慧芳、李冬宝、赵小云等人物的身上，分别看到了女性、市民、打工妹等最为朴素与真实的一面，他们虽然是小人物，但和那些虚构的武侠人物不一样，身上发生的故事，口中讲出的语言，

与社会上无数个

小人物是一致的，他们身上所洋溢的那种乐观精神、奋斗力量，

也给了当时无数观众以情感上的安慰与鼓舞。

进入21世纪之后，影视作品创作又发生了一轮新的变化，《集结号》、《风声》、《暗算》等一批好看的影视剧，让观众清楚地发现，它们与二三十年前看到的战争片、谍战片有了很大的不同，在这些影视剧中，敌人不再那么容易对付，胜利不再那么容易获得，正反角色也有了更为丰富的呈现。制作水平的

提高，让这些影视剧看上去节奏更快、气氛更紧张了，但它们的核心价值并没有变，仍然在讲对善良的仰望、对信仰的捍卫、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些被冠以“新主旋律”称谓的影视剧，真切地让观众感受到了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会更为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安稳。

作家周国平曾说，“真、善、美是人类古老而常新的精神价值。人类所追求的一切美好的词汇，几乎都可以归结到这三个词。”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影视剧自然离不开对真善美的描摹与弘扬，故事可以换种讲法，影视剧的气质可以有所变化，但“真善美”这个价值核心，却应该是永远坚固存在的。

最重要的是展现世相之真、人心之善以及人性之美。

十日谈

影视中的真善美

责编：杨晓晖